

西夏李氏世譜

編纂

李鴻儀

整理

李培業



遼寧民族出版社

西夏李氏世譜

编纂 李鸿仪

整理 李培业

辽宁民族出版社

西夏皇裔调查纪实(代序)

李范文

一九七三年五月,我在宁夏已经搜集三万余张《夏汉字典》的单词卡片,用四角号码编排,带去北京搜集补充新的资料,投师罗福颐、王静如二位先生,听取他们对字典的编纂意见。十月,工作告一段落,我便去拜访告别十三年的挚友——著名藏学家王尧教授。由于历史误会,十三年来我们从未通信联系,突然见面,感慨万端,由于我的处境仍然使人见而生畏,我们心照不宣,只谈业务,不言其它。他热情地向我介绍国内外研究西夏的专家学者。记得最清楚的是原四川大学教授、后任重庆博物馆馆长邓少琴和法国的石泰安(R. A. Stein)。他说邓先生曾在一九四五年写过《西康木雅乡西吴王考》一书,中国学典馆出版。回银后我即致函询问,不久邓先生复函并寄来该书的照片。从此我与邓老成了忘年神交。一九八〇年五月—九月,我根据他提供的资料,沿着党项人北徙的路线,调查西夏遗民。九月,我从成都专程去重庆拜访他,老人年逾八旬,孤身一人,仅有学生义务服侍老人,一九八一年,他虽年逾八旬,还来宁夏参加首届西夏学术讨论会。后来他曾来函谈了他的两件心事:(一)儿在康定农牧局工作,康定不放。(二)他的挚友,很有学问,因解放前在中学任校长,颇有威望,而被选为国大代表。解放后成了专政对象,无工作,全靠他接济。他对四川史志很有研究,乞我求得一碗饭吃。一九八三年,原康定县委组织部部长杨明来宁夏看望她的哥哥马若(化名,时任宁夏文化厅厅长),因我去康定调查,曾去拜访过她,她来我家看我,我即将邓老孩子的事告诉她,请她帮助解决。大约不到半年,他来信说:他的孩子已调回成都,在省畜牧局工作。一九八〇年八月,四川省委杨书记及其秘书去道孚考察,听说宁夏有位学者正在此调查,因住同一招待所,他召见了。他的秘书对我讲:今后您在四川有什么事,尽管告诉他,他可尽力帮助。我接邓老信后,立即给这位秘书去了一信,大约过了不到半年,老人给我写了一幅字,并说他的朋友已安排在四川省文史馆工作,我感到欣慰。我非常感谢杨明部长和那位说话算数的秘书。大约过了一年多的时间,我没有见到他的来信,后来我从川大吴天墀教授那里获悉,先生在成都某医院与世长辞了。这位为探寻西夏遗民的先驱就这样

离开了人间。恶噩传来，使我悲痛万分。

邓老寄赠的《西康木雅乡西吴王考》一书，使我受益匪浅。所谓「西吴王」者，乃西夏王也。「西吴阿尔布者，曾为汉地北方之王，所居之地曰「木雅」，其来此亦以木雅名焉，故至今仍称木雅。西康康定县折多山以西，雅龙江以东，乾宁（泰宁）县以南，九龙县以北之地，今仍以上下木雅乡称之」。「此西吴王者，后为明正土司」。「夫如是乃恍然「西吴阿尔布」者盖西夏被灭于蒙古主后，而建立小国于西康域中之称也」。「西康之西吴王者，在封域中，竟失其事，此足以补正史之缺，不可以不记矣。」为什么？他说：「西夏之亡，南徙而建立小邦，洪武后授为明正土司，至清康熙三十九年（一七〇〇年），嗣断而绝，传世凡五百载。」我对邓老的调查和考证，深信不疑。故于一九八〇年我去木雅调查，不仅听到「西吴阿尔布」的传说，而且我走访了明正土司之后裔，拍摄了嘉拉·降泽的照片，以及西吴阿尔布遗址。还写了《明正土司》、《西吴王》、《木雅甲布》等专题文章。然而我在藏、汉、夏文字里均未找出确凿的证据，乃为学者们的推断而已，包括邓老的《西吴王考》亦然，故我以《西夏遗民调查记》为题。调查中我既未见到任何家谱，也未见到任何西夏文物，因此要说康定道孚等地的木雅人，很可能是未被迁徙而留居下来的弭药人，这部分人中，有无西夏灭亡时逃回老家西夏人？有这种可能，而无这种佐证。

一九九四年十月，我院历史所副所长景永时告诉我，青海师范大学张星晨先生来函说，西北大学数学系教授李培业家藏西夏李氏家谱。我当即致函联系，十月十八日他复函云：「远辱手翰，如天而降，先生大作，早已拜读。奈天缘不假，奉教无从，正拟肃笺申怀，乃承华函先颁，何幸如之。」

「卑人系青海李土司之后，李土司《明史》、《清史稿》有传，但其族源与家传《李氏家谱》不合。据家谱内碑文、序文所记（如李英神道碑，李英《明史》有传），均言李氏为西夏国主后裔。而碑、序作者大都在《明史》有传，如国史总裁胡俨（字若思）、东阁大学士王家屏、都察院左都御史马文升等。撰文作于明初，距西夏灭亡不远，碑文所言，皆有所本。故史料可靠，尤其世系表自南平王颙而下，直叙我辈（我为南平王二十三世孙），颇为珍贵」。

「先父李鸿仪，民国初毕业于甘肃第一师范，从事教育终生。一九七二年病逝。一生研究家谱，收集史料甚丰……惜文革中家藏万卷古书及各种碑文拓本，被「红卫兵」付之一炬，化为灰烬，今已不可复睹矣。幸有十部家谱，由先父密藏墙壁中，免于丙丁之灾。先父临终前告诉我地址，灾后掘出，重见天日，由我珍藏」等等。

我接信后，立即查阅了《明史》，李英、胡俨、王家屏、马文升，所言属实，均有记载。于是决定前往，致函联系。十月

三十一日李氏复函：

「阁下欲光临寒舍，参阅谱牒，万分欢迎。」

「盼大驾光临，行前来电，我全家清道相迎。」

十一月八日下午四时，我乘长途汽车，日夜兼程，于九日上午九时，抵达古城西安，十二时三〇分，我终于来到李氏府上。我们一见如故，立即捧出十部家谱，我一面听他的介绍，一面翻阅家谱，琳琅满目，目不暇接，只好先请他介绍。他说：

「这十部家谱，有乾隆时写的两部，道光时写的一部，光绪时写的一部，民国初年写的两部，还有三十年代、四十年代，直到解放后写的四部。此外，抄录西夏历史文献的一部，还不计其内。这十部中，最有价值的是《李氏家乘》，因为它集录明代文献最多，但并非完备，因为它是我父亲早期的作品。以后还时有新发现的史料，散见于以后作品。清代家谱，以道光时的一部最有价值，因为其中抄录了明代碑文，而在碑文中恰恰记载了李氏系西夏国主之后裔。」

我问：这些家谱的真实性如何？有何学术价值？

他说：「这些家谱中收集了很多明代文献（序跋、碑铭、古刻石铭文、敕诰等），各种文献均指出李氏系西夏国主后裔。我认为史料是真实可靠的，有的碑，解放后才毁灭，六十岁以上的当地人都见过。所以，绝非伪造品。写这些序跋、碑铭的，有的是明王朝的国史馆总裁、国子监祭酒，《明史》有传，他们写的文字是可信的」。

「这些家谱的学术价值，我认为有以下三点：首先这是西夏史上的重大发现。几十年来，西夏史学者苦苦探索的问题：西夏灭亡后，其民族到何处去了？现在还存在吗？特别是对皇族一姓，无疑是突破性的解答。因此而引起的调查研究，可以为西夏学开辟了一个新的研究领域。其次，其中碑文和敕诰，对《明史》中有关问题有所补充匡正。最后，对青海地方史的研究无疑是宝贵资料」。

尽管他讲得很有道理，但我必须站在对立面，带着挑剔的口吻问他：如果有人怀疑这些家谱的真实性，说您不是西夏皇族，说这些家谱不可靠，您怎样想？能一一驳斥吗？

这样提问，使主人感到尴尬，回答的语气有些激动，然而却有条不紊。他说：「除非你不承认历史的记载，除非你证明这些碑铭和序跋是伪造的，否则我就是西夏国主的后裔。西夏国主后裔，对我来说并没有多大的荣耀，我也没有必要硬戴此桂冠，但这是历史事实，谁也无法抹杀的。如果有人用与此相反的明代资料文献来反驳，我们可以分析研

究，究竟何者真实可靠。如果用清代文献来反駁，我一概置之不理，只能说：先生，请你记住，我这是明代的碑铭！」虽然我们谈论的很热烈，但此时的气氛略有紧张。这时我如梦方醒，长途颠簸，一夜未眠的疲劳与尚未吃午餐的饥饿困扰着我。便与李培业合影，告辞。

然我又担心自己年逾花甲，功成名就，一旦报道一个冒牌货，岂不身败名裂，貽笑大方！

为此，当晚我拜访了陕西省人民政府咨询委员会委员、法律顾问李文华律师。他既是我中学的同窗好友，又是西安的著名律师，对文物鉴别及各种人物的心理状态颇有研究。我请他去帮助鉴定家谱，识别本人。第二天上午，他以我的腿疾行动不便，陪同前往李家。寒暄后，我们请他拿出家谱翻阅。文华的同事，正好与李培业同为西北大学五十年代的助教，一九五七年下放安康。他们似乎有了共同语言，从文华的脸色，以及他对家谱的反复提问，我知道他确实是行家，从交谈中未发现破绽。李培业说，他下午五时要去临潼讲学，我即提出是否可以同他前往继续采访，并希望把全部家谱带去共同研究。他答应我可以去，但家谱不能全带，只能带一部，因为这是他的「传家宝」，用生命保存下来的。这种心情我是理解的。

中午告辞后，我同文华展开了讨论。他认为：（一）家谱虽不是明以前的遗物，但却是真品，并非赝品，更不是他本人伪造的。（文华的话很有分寸，在他的嘴里能听到「不是本人伪造的」，我如释重负。）（二）李培业并非凡夫俗子，也不是一般干部和工人，更不是什么无业游民，他是高级知识分子，堂堂正正的大学教授，专家学者，陕西省教育界的先进代表。他不是骗子，他的话是可信的。

鉴于这种情况，我于当天下午四时赶去他家，继续跟踪采访。

第二天上午，我们一起到了临潼，他去讲学，把带去的家谱留给我阅读。晚上我们继续交谈。

我问：如果从这些家谱中选择一二种加以研究，进行校注，予以发表，您同意吗？

他说：「我的兄弟和我的孩子从前年开始，屡屡催我整理家谱，早些公开发表，我因忙于教学和科研，无暇及此，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这是一个重大问题，必须审慎，对其中每个问题，我都必须深入研究。一九九一年夏天，在一个国际数学史会议上，我碰到了青海省地方志学会的负责人，谈及李氏族源，在青海史学界意见极不一致，而鲜闻系西夏后裔。他请我去青海师大作一次学术报告，我答应了他的邀请。在两年时间内我集中查阅了《元史》、《明史》、《清史稿》及父亲所搜集的《甘肃通志》、《西宁府志》和李士司各种供状……，并参阅各种家谱，集中驳斥了李氏系晋王（按：

指突厥族李克用，因助唐有功，而封晋王）后裔的谬说，写成报告材料，于去年夏天在青海师大作了讲演，引起青海史学界的关注，至今还未听到相反的意见。

早在五十年代，我在西北大学读书时，受父亲之命，于课余抄录有关西夏史料，父亲用工笔誊写，有四大本，现由我珍藏。我从小受父亲影响，耳濡目染，对家谱中史料比较熟悉。经过长时间的研究，深信我李氏系西夏国主后裔。在这种情况下，我认为已是公开发表的时候了。

关于发表方式，起先我家中多数人赞同以李氏后裔名义发表，意思是不愿外人参与。您远道而来，并且是西夏学方面的权威专家，我们一家人为您的诚挚精神所感动，决定与您合作。这次合作如不成，我们再也不与国内任何人合作。我父亲开始研究《李氏家谱》，不是为了联宗，维护封建宗法等目的，更不是藉祖勋以自荣，而是为了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这种治史原则，五十年如一日。他在西陲边鄙，缺乏资料的情况下，远搜近采，广为裒辑，详阅正史、方志及土司供状，旁及稗官野史、各门重修家谱，造访遗老，亲谒祖墓，抄录古碑古刻，使《李氏家谱》灿然详备。我可以宣告世人，他的确是位民间史学家。十年文革期间，他因此受到各种打击和残酷迫害，以致忧郁而死。他冒着生命危险，想尽各种办法，保存下来了这些珍贵的资料。临终前，念念不忘存放处，把我从安康召回，让我记住放处之标记。作为后代，出版《李氏家谱》，以此告慰先父，使他在九泉之下，得以瞑目。」（讲到这时，他的眼泪夺眶而出，长时间说不出话来，夫人在旁安慰：「你已六十岁的人了，还那么动感情，不怕伤了身体」。他那种像孩子一样恸哭的样子，使我同病相怜，叫人揪心难忍。）

我问：您认为西夏皇族现在还有多少人？散居何处？他们是否保留着家谱和有关资料？有没有会讲本民族语言的？

他说：「李氏后代主要散居湟水流域，未做统计，不知有多少。据最新出版的《乐都县志》记载：乐都县的一个边远乡，共有李姓二百四十一户，一千二百八十七人，而在乐都的寿乐、中岭、李家、马营、高庙、蒲台等乡，则是李氏集中居住地，人数更多了。明代家谱言：湟水三万户，李氏居其半。湟中县、平安县、民和县、互助县、大通县、西宁市尚不知有多少？其它省区也有李氏族人，例如陕西华阴和山西的大同在明代就有派往其地做官的。我相信大同和华阴的方志上定有记载。据说李自成声言他是李继迁的后代，如果你们宁夏方面如作此项调查，我愿参加。关于文献记载和语言情况，我来调查，不敢妄言。」

我问：听说部分李氏改为汉族，后来又改为土族，土族并非党项族，您对此有何看法？

他说：「李氏改为土族是有原因的：（一）在青海互助土族自治县和毗邻的乐都达拉乡，其中有李姓受土族影响而说土语的，人们因此而误认为土族的。（二）地方志误认为是土族的，如《甘肃新通志》记载：李南哥，西宁卫土人。列入兵防志土族内。（三）对李土司的族源尚未弄清楚。我们的《李氏家谱》一出，会改变这些看法。李姓改为土族是历史的误会。」

当我翻阅家谱时发现他们在追溯族源时，有的与北魏皇帝之祖先黄帝少子昌意联系起来，有的与汉朝将军李广联系起来，更有甚者说沙陀李克用是拓跋思恭的爷爷。记得元昊称帝时向北宋陈表云，「臣祖宗本出帝胄，当东晋之末运，创后魏之初基，」和夏夏臣僚罗世昌所述西夏国谱时亦云：「元魏衰微，居松州者，因以旧姓为拓跋氏」。因此，有志断定他们是鲜卑拓跋氏，而不是党项拓跋氏。为此我写了《试论西夏党项族的来源与变迁》一文（见拙著《西夏研究论集》，宁夏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三年版），对元昊称帝高攀元魏之说加以批驳。我说：「在历史上，大凡一个新的统治者，因受正统观念与阉阉门第思想的影响，他们及其史臣总要为其先世找一个高门世族高攀一番的，远的不说，就以元昊高攀的北魏为例」作了批驳。并举了魏收与杜弼的例子，魏收借修史来酬恩报怨，凡史官的祖先姻戚，多列史传，饰以美言，在列传人物的取舍褒贬上，触犯了门阀地主，使诸家子孙控诉不平者百余人，皇帝高洋庇护魏收，因为他为北魏臆造了一个离奇的祖先传说，为他当皇帝找到了名正言顺的依据。相反，当高洋问他的大臣杜弼：「治国该用哪种人？」杜弼如实回答：「鲜卑人只会骑马乘车，治国还该用汉人」。高洋以为讥刺自己，怀恨在心，终于杀了杜弼。

回忆起这段历史，我不仅想到历代皇帝有这种心理，难道西夏皇裔就没有这种心理？

于是，我问：你们这个民族，一会儿称党项，一会儿称弥药，一会儿称唐兀氏，一会儿称西番，一会儿又称鲜卑，一会儿又称拓跋氏，一会儿又称土族，一会儿又称汉族……，论其族源，不是把鲜卑拓跋氏联系起来，就是同突厥族李克用联系起来，您对这些问题是怎样认识的？

他说：「关于西夏族属问题，不是我研究的重点，但我也注意了这个问题，以我现有的资料对比研究，我同意西夏是党项民族的观点。至于这个民族后来出现这么多称呼，情况很复杂，有因为其他民族对党项称谓不一样，而音译不一致的，有因为西夏本民族忌讳免祸而改称其他民族的，有因为对其族源未弄清楚各持己见的。对于这个问题，西夏史学者进行了大量考证，我尚未做全面深入地研究，故不敢妄置一辞。」

至于家谱出现族源追溯到李广、李克用，并有拓跋思恭是李克用的孙子之记载，早在先父在兰州求学时请教史学家已予以批驳。这个问题是我研究《李氏家谱》的重点，也是我在青海师大做报告的中心问题，我已做了大量考证，在明年国际西夏学研讨会上，我将正式发表自己的看法。」

我们的谈话，既紧张，又活泼，时而高声争吵，争得面红耳赤，时而哈哈大笑。他对四书五经背得滚瓜烂熟，对答如流，使人肃然起敬。使我不禁想起西夏为何在西北这块土地上长治久安？这不能不说他们对汉文化多么的尊重和热爱，他们对家学又是多么重视啊！在他身上我似乎看到了西夏人的自强不息的精神。一九五六年当他还在西北大学求学时，他回家乡见到当时农民的生活不太好，回来后他给董必武副主席写了一封信。次年，他以优异成绩毕业留校任助教已一年之际，《中国青年报》刊登了他给董老的信，说什么统购统销搞糟了，农民生活今不如昔……，为此把他当作「右派分子」批斗，但他死死抓住董老在信上批示的一句话「虽然这位青年言词过于激烈，然而他的本意是好的」。「本意是好的」而免去了「右派」的「桂冠」。但是仍然把他下放去安康山区教中学，一去就是二十多个春秋。在那样艰苦的环境里，他不仅把四个孩子都培养成大学生，而且在山沟里还写出了数学史论文，在日本发表，引起日本数学家对他的敬仰，来古城西安访问，非要接见此人不可。他因此而调回西安。回西安后，短短数年，写了九十余篇论文，还有专著出版，并且破格晋升教授，怎不使人钦佩！尽管如此，我对他究竟是否是南平王、西夏末主李睍的后裔，仍然存疑。我问：如果有人说你不是李睍的后裔，说你们的家谱不是古人写的，而是你们自己写的，您能提出确凿的佐证吗？

李答：「能。我的十种家谱，除一种是王学尹写的外，其余均由我李氏几代人所写。但是，我断定李氏为西夏国主后裔，是根据明代历史文献而非我李氏自己的传说或臆造，这与家谱谁人所写有关吗？确凿的记载就是明代文献，读者会得出和我一致的结论。」

我的采访在此告一段落。主人盛情，派车送我去咸阳机场，大雪纷飞，衣薄身寒。

所幸的是，这次调查颇有收获。回到银川后，我将案头堆积的工作处理完，立即整理采访报道。十一月十九日，宁夏电视台派车接我去参观横城堡西夏影视城，宣传部张怀武副部长见到我后，问我何时回来，收获怎样？我说收获不少。身旁《宁夏广播电视报》记者杨志刚紧追不舍，问什么收获？我即将调查西夏皇裔之事告诉了他，他如获至宝，立即向我要材料，我答应星期三给他。当天回家连夜赶出，星期一我向《宁夏日报》周末版取得联系。该报当即派记者王

海刚、马文锋前来采访，他们回后即来电通知：他们领导决定十一月二十三日发表消息，二十六日全文登载。星期三《宁夏日报》头版以醒目标题《西夏皇裔今尚在》刊出，当天新华社分社吴国清，《光明日报》记者庄电一，《银川晚报》记者黄建中，《宁夏广播电视报》记者杨志刚先后赶来采访。十一月二十六日《宁夏日报》周末版头版套色整版登了我的采访全文——《我是西夏皇裔》，二十七日《银川晚报》套色头版全文刊载《西夏皇裔今尚在，千古之谜终揭开》，接着《人民日报》海外版、《光明日报》、《解放军报》、《新华社每日电讯报》、《文摘报》、《西安日报》等先后报道了这件事。不少同志见报后，纷纷来电、来函询问情况，表示祝贺。也有提供信息，反映情况的。陕西省文史馆馆员、陕西师大教授江弘基先生及夫人戴兰芳教师于十二月七日来函，并赋词祝贺：「你为西夏学研究开拓了新的领域，可喜！可贺！兹寄赠拙作小词一首，聊表贺忱。」

贺李范文教授发现西夏皇裔

西夏介遣何所寻？哑谜难解迄于今。

屠城灭国备仇深，兴府空余累累陵。

故园但有木森森，长安皇裔学人心。」

北京挚友王尧教授来函说：「甚为高兴！辛勤劳动，卓然有成，海内外人所共钦。困境中挺然昂然，不为俗事所牵，实在难得！」他希望我「大展鸿猷，为国争光！」

江戴教师还寄来十二月六日《西安日报》题为《西夏皇裔及家谱在西安发现》的剪报。他们如此关怀和鼓励，使人感到在我们国家，每逢你有所前进、有所收获、有所创造、有所发明，都会受到你的亲友、师生、周围同志们的欢迎和鼓励，使你增加无限的克服困难的勇气，不断前进的决心。

当然，我不是说所有的人都为我唱赞歌。一位颇有才华的青年学者，我十分信赖他，给他寄去十一月二十六日的《宁夏日报》周末版。万万没有想到他对李培业教授采取了完全否定的态度，使我大吃一惊。在我同李培业教授相处期间，我觉得他功底绝不是对于历史学、文献学乃至科学基本方法都是个百分之百的外行，而是一位饱学经史的专家。

当然，我不是说《西夏李氏家谱》天衣无缝，百分之百的正确，毫无怀疑之处，例如上面已谈，在族源上有意攀高，从赏哥至南哥，在正史上尚未找出佐证，还需要做大量工作。读者有这样和那样的怀疑都是应该的，我和李培业教授有权向大家（读者）解释。我认为对李氏家谱不仅要查各种资料，而且要实地调查，它不仅揭开了西夏皇裔今尚在的秘

密。而且对成吉思汗的评价也得重新考虑，西夏皇族被成吉思汗斩尽杀绝之说，不复成立。丝绸之路上的神秘王国——西夏，蒙在她头上的面纱将会慢慢揭开，人们会看到这个伟大的民族所创造的光辉历史和灿烂文化，不仅看到古老的文化遗迹，而且也可以看到她的子孙后代！

〔原载《宁夏文史》（第十一辑），一九九五年二月〕

前言

(一)

一九九一年八月，我受著名数学史家李迪先生的邀请，去内蒙古包头市参加数学史国际学术讨论会，恰与青海师范大学科研处处长张定邦先生住同一房间。因为有同乡之谊，我们一见如故。他是青海地方志学会负责人，对青海史志颇有研究。我的祖先李土司是青海历史上举足轻重的人物，所以闲谈中多涉及到李土司的历史。他说关于李土司族源，青海史学界看法不一，有沙陀说、吐谷浑说，而鲜闻西夏说。我的父亲李鸿仪（一八九七—一九七二）一生研治《李氏家谱》，早在一九二〇年首先提出李土司系西夏皇族后裔观点，并以此观点撰写二三十种家谱流传于世。由于未正式发表论文，学术界尚未闻。张定邦先生对此非常感兴趣。他当即提出，适当时候，青海地方志学会召开年会时，邀请我去做一次学术报告，我即欣然应命。

我从小受父亲影响，对祖先历史颇感兴趣。特别是他精心编了一本《谱系四言赞语》，用韵文写成，我小时诵读不辍，全本读完，对李氏历史，多所了解。我在五十年代于西北大学读书时，受父亲之命，在西大图书馆收集西夏史料，抄寄给父亲，使他在晚年完成《西夏史略》（一九六〇），从中也学到了不少西夏历史知识。答应张定邦先生邀请后，我在两年时间内集中查阅了《元史》、《明史》、《清史稿》及父亲所搜集的《甘肃新通志》、《西宁府志》和李土司的各种供状，……并参阅各种家谱，集中驳斥了李氏系晋王李克用后裔的谬说，写成论文《李土司族源考》（即后来发表的《西夏皇族后裔考》及《西夏皇族后裔再考》两文，见本书「附录」）。在一九九三年七月二十一日于青海师范大学召开的青海史志研究学会年会上发表。因为当年八月我去日本作学术访问，所以作报告后，没来得及与青海史学界同志交换看法，听取他们的宝贵意见，便匆匆离开西宁，此事也就搁置了起来。

我作学术报告的消息传到了我国著名的西夏学专家李范文先生那里，他立即和我取得联系，不顾长途跋涉的疲

劳，从银川市连夜乘坐长途汽车，于一九九四年十一月九日到达古城西安，来寒舍鉴赏我所藏的十部李氏家谱。回去后立即向记者发表访问消息。《宁夏日报》于一九九四年十一月二十三日第一版首先发表了《西夏皇裔今尚在》的报道。接着《宁夏日报》、《银川日报》分别于十一月二十六日和二十七日用头版整版的篇幅发表了李范文先生的长篇访问记。随后《人民日报》、《光明日报》、《解放军报》以及各省大报均发表了西夏皇族家谱问世的消息（参看本书「附录」）。陕西电视台和中央电视台也分别在十二月十一日和十六日报道了这条消息。一时「西夏皇裔今尚在」的消息传遍了中外史学界。

一九九五年八月，我应李范文先生邀请，参加了在银川市召开的首届西夏学国际学术报告会，同时被邀请参加的还有我的堂兄李培业和我的夫人吴万香。我在大会上发表了论文《西夏皇族后裔考》（载《西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一九九五年第三期），李培业发表了论文《民间西夏史学家李鸿仪先生》（载《西羌文化》一九九六年第一期）。引起与会专家们的特别关注。他们有的提出共同研究，有的企盼早日出版这一西夏史料。特别是李范文先生怂恿我整理出版《西夏李氏世谱》，曾多次来信讨论出版问题。正是学者们的热情鼓励和顿促，使我暂时放下自己的科研工作，投身于整理家谱的工作上来。经过两年的紧张劳动，终于完成了这项工作。

西夏皇族后裔的历史，过去是一片空白。如果在这一片空白纸上，增添些色彩，使得西夏学更加完美，则是非常有意义的事。我做为西夏皇族后裔的一员，应是当仁不让。我父亲为此奋斗了一生，后竟以此遭祸。今天他的遗愿能够得以实现，说明禁闭科学的大门已经打开，科学的春天已经降临了人间。先父地下若有知，则一定会感到欣慰的。

（一）

我们在这里简述一下西夏皇族后裔的发展史，并对他们的历史作用做一点评价。

据谱载：「李赏哥，南平王李睨之子。初镇守朔方，嗣以金吾职守宁夏灵州，及元以都指挥驻鄯州，为祁王府官，谥郡善王」。李英神道碑文云：「按公讳英，字士杰。其先出元魏，至唐拓跋思恭，以平黄巢功，赐姓李氏。世长西夏，自宋及元，以武功显白者甚众，其居西宁曰赏哥。」由此可知，元灭西夏后，赏哥自灵州迁居西宁，为元祁王府官，是为初到青海之始祖。赏哥生子梅的古，古生管吉禄，为司马，又任王府教授。其子李南哥，为元西宁州同知，明洪武四年（一三

七一)以州归附明朝。明太祖嘉其诚,授忠显校尉,旋升西宁卫指挥使。十九年(一三八六)奉命佐长兴侯耿秉文经略西平,修筑西宁城池,安抚巴沙等蕃族。又以收纳罕东酋长锁南吉刺有功,晋秩西宁卫指挥僉事。开创西宁卫,居功最多,因有世袭之职。

李南哥之子李英,字士杰。「自少聪颖不凡。及长,体魄魁杰,臂力过人。精于骑射,尤好儒术。輒铃经史,讲肄无暇逸。」曾多次随明成祖亲征。永乐九年(一四一一),明成祖扈驾亲统六师,出沙漠,剿本雅失里於玄冥河,抓获阿鲁台於广漠戍。李英跟随亲征,论功定赏,升指挥同知。永乐十年(一四一二),番酋老的罕叛乱,李英率各路土司兵赴凉州沙金城讨伐,於讨来川获大胜,俘斩三百六十人。乘胜追击,终至全歼,进都指挥僉事。永乐十三年(一四一五),明成祖又北征,李英从扈,以捕获过当,屡敕奖谕。自是扈驾者再。

明仁宗洪熙元年(一四二五),明使乔来喜、邓成等奉命出使西域,途经安定、曲先地区(今格尔木一带)。该地区诸番部,结聚强寇,安定指挥哈三孙散哥、曲先指挥散即思,率众杀使臣,尽夺驼马币物而去。仁宗大怒,命李英讨安定。李英率西宁卫军及十二番族之众,深入追贼。逾昆仑山,西行数百里,抵雅令阔之地。遇安定贼,击败之。俘斩千一百余人,获驼马牛十三万有奇。抓获安定王桑尔加什夹。曲先闻风远窜,追之不及而还。宣宗嘉英功,遣使褒谕。令驰驿入朝。既至,擢右府左都督。宣德二年(一四二七)封会宁伯,食禄一千一百石。

宣德七年(一四三二),李英帮助外甥祁监藏夺西宁指挥祁震之子祁成的职。在京杖人死,论罪夺爵,下狱论死。正统二年(一四三七),帝念旧勋,遂释之。正统七年(一四四二)病卒,享年六十。葬民和享堂,有神道碑。英子昶,袭锦衣卫都指挥僉事。后升右军都督府都督管事。成化六年(一四七〇)巡历保定等府,赈济饥民。十四年(一四七八)同尚书刘昭修筑卢沟河堤岸五千余丈。十五年(一七四九)调五军左掖管操,寻调神机营管操。弘治六年五月(一四九三)卒。祖生子十三,于正德五年(一五一〇)蒙部印分关,分居青海湟中、大通、互助、乐都、民和等县,共四十五处。所谓东府十三门,分派于此。次子李玘,继承世职,为东府李土司(见东府土司世系表及东府各门世系表)。

李文为李英侄,观音保之子。观音保之父察汗铁木耳与李南哥为亲兄弟,察汗居长。李文,字尔雅。宣德间为陕西行部都司指挥僉事。攻破曲先贼散即思及其党脱脱不花等。累官都指挥使。天顺元年(一四五七),以迎驾功进都督僉事。未几,以右都督出镇大同。寇二千余犯威远,文率师败之,封高阳伯。以失机降都督僉事。后因杀贼有功,仍升为同知。致仕。弘治二年(一四八九)卒于家,享年八十有四。计闻,仍赠高阳伯。李文生子十,于成化十五年(一四七

九)分居青海湟中、大通、互助、乐都等县,所谓西府十门分派于此。次子铺,继承世职,即西府李土司(见西府土司世系表及西府各门世系表)。

西夏李氏后裔,除上述东西二府共二十三门外,尚有中府一支,乐都卯寨沟新庄一支,慧隆寺一支。各见其世系表,兹不再述。

李土司在明代最为兴盛。至清地位每况愈下。此因清雍正三年(一七二五)后,西宁府下,设西宁、碾伯二县,地方权力由土司之手逐渐移于政府。另外,清朝兵力依靠八骑兵及绿营兵,土司兵力缩小。这样以武功建立的土司世袭制已逐渐失去其作用。但这种世袭制仍维持到了清末。清末虽有改土归流之议,而未见实行。民国成立,令袭世职如旧,但土司仅管差赋,不得听讼。民国二十年,青海民政厅以明令取消青海各土司由,呈请内政部,后奉行政院民国二十年八月十三日第五〇三号指令撤销土司。土司之寿命,从此告终矣。

明、清时代在西北、西南少数民族地区设立土司制度,分封各民族首领世袭官职,以统治当地人民。在元代以前,各封建王朝就已采取「以土官治土民」,即封赠边疆各族首领官爵以统治本族人民的办法。对于这种制度,史家褒贬不一。我以为对各土司的历史环境,所处地位,所行事迹,要做具体分析,不能一概而论。

总观李土司历史,在明、清二代,归附皇朝,平定边疆叛乱,招抚少数民族首领,对青海地区的各民族安定团结起了良好作用。对扩展疆土,统一祖国也做出了积极贡献。西宁地处少数民族与汉族交界地带,当时少数民族是奴隶制,奴隶主经常发动叛乱,侵扰边疆居民,李土司实际上起了镇压叛乱的作用。《清史稿》土司传说:「清改甘肃为省,各土司仍其旧。有捍卫之劳,无悖叛之事」。又说:「土官易制,绝不类蜀黔诸土司,桀骜难驯也。」说明青海土司对祖国统一是有功劳的。

有人认为李土司是农奴制生产方式,严重地阻碍了当地农业生产发展,我对此不敢苟同。诚然,西北、西南各土司施行过农奴制,有的还延续到解放前。但对李土司的统治应作历史考察。在李土司统治的五百年中,其社会性质、生产方式逐步在变化,由农奴制到封建制度变动。开头土司分封土地,统一于土司管理之下,后来家大人繁,分配土地。土地为各族舍人所有。后来各门人口增多,开垦荒地,与当地居民混居一处,已不属于统治集团,有的成为自耕农,有的甚至沦为佃户。《西宁府新志》说:「(土司)之裔输粮供役,与民无异。俊秀读书,也应文试」。「所分田土,多属民间,与民群杂而居,联姻结社」。可见与当地居民没有多少区别了。

李土司自明初汉化，极力吸收汉族文化。各土司并非只一介武夫，他们的文化水平亦相当高。李英文武双全，其孙李玘，幼喜读书，中成化庚子科举人，又中成化辛丑科进士。初授中书舍人，历官尚宝司丞。李玘孙李崇文，「生而有英气，猿臂善射，年几冠，喜游猎，从二三节侠，走马长安道中，酣歌慷慨，睥睨一世，时人莫测也」。是一位豪爽之士。李崇文之子李光先，万历癸未科进士，升锦衣卫正堂，执金吾，领禁卫，在京城作官。李玘之侄李完，系世袭百户李化鳌之曾祖。嘉靖戊子科举人，任直隶衡水县知县，工古文词，曾上书陈言革壮浪参将带管西宁事。疏文论理清楚，铮铮有声，得到皇帝赞成。李文虽为武将，赫赫战功，但亦能文，其《游白塔寺》一诗，有「白塔连云起，黄河带雨流」句，颇工整。李凌霄，字万程。其墓志铭云：「牙签盈几，词客满座。……花晨月夕，美景良宵，或剪烛秋窗，或围炉雪洞，拉闲谈古话，拈韵咏新诗，此皆不可医之癖。」很有超俗的文士风度。其子问彭，「为人慷慨好义，以翩翩公子，最嗜读书，诗文书画，皆擅其长。」各代土司皆有很高的文化修养，其诗文佳作，收入艺文谱可以作证。

由于李土司历代有能文能武领导者出现，汉化程度非一般所可比。我们在家谱中看到家礼、家训，皆遵儒家学说，尤重程朱。完全是封建礼教，绝无奴隶制法规。所以自明清以来，河湟一带，已进入了封建社会。

李土司及其舍人对当地畜牧业、农业发展起了积极作用。李英提倡农垦，兴建水利，招徕内地亡民，安置开垦，引进内地先进技术，发展生产。又施行屯田政策，卫所军士，三分守城，七分屯田，对农业发展贡献很大。土司李玘，倡导水利，他在上川口修札都水渠，变旱地为水地，是一浩大工程，有《新修札都水渠记》以记其盛（见「艺文谱」）。各门李氏后裔，散居海东地区各县。多聚集某一村庄，开避草莱，建功立业，对当地经济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可惜我没有时间多做调查，只对居住在乐都县旱地湾村东府第十一门做了初步调查，写成材料（见十一门世系表「小引」），以见一斑。总之，西夏皇族后裔，秉承帝王之伟业，迁居青海，开避一片新天地，成绩昭著，对青海东部的发展起了历史推动作用。诚如李鸿仪所作对联所云：「由唐季发迹以来，威震朔方，十世垂勋兴大夏，自元初驻鄯而后，绩昭西土，廿辈余烈比长春。」一个王朝被灭后，其后代尚能延续数百年显赫于世，这在历史上也是很少见的。

(三)

我们在这里先考察一下李氏家谱编纂的历史，以便对《西夏李氏世谱》的来源有所了解。

考李氏家谱，明初已有人编纂。弘治八年（一四九五）高阳伯李文墓志铭中说：「其余支出高曾，派分伯叔，家世源流，爵秩始末，载在行状，兹不赘述，且见于谱志者备矣。」证明当时已有李氏家谱。现存最早一篇谱序，撰于明景泰四年（一四五三），作者为刘昭。刘昭《明史》有传，言镇西宁二十年，治边有功，累进都督同知。事在宣德间。他在西宁任取期间，恰是李英袭父职为西宁卫指挥使。与其子李和相与为善，共修过卢沟河堤岸，请为作序，亦或有之。序内虽未言及族源，但于此时李英、李文碑文中已明确指出系西夏皇族之裔，故可推知明初李氏家谱内记载亦是如此。今所考的明代家谱尚有三种，李宁所修撰的《李氏忠贞录》，作于嘉靖十五年（一五三六），有赵载序存于今。李宁，字东村，会宁伯李英之曾孙，官至锦衣卫指挥使。此谱立拓跋思恭为始祖，内容分三部分：一、玉音：历代皇帝给李氏祖先的敕诰；二、族谱：即世系表；三、赠遗：为当代名公给李宁祖父李昶及父亲李玘的贺文和挽辞，还附录有几代承袭世职的大事年表。明代家谱尚有万历二十年（一五九二）纂修的《李氏世系渊源谱》，有东阁大学士王家屏序，对李氏渊源叙述更为详细（见「序跋谱」）。我家世传的《李氏六门家谱》则是明代的最后一部家谱。此谱为东府六门十一世李云龙所纂修。有万历二十二年（一五九四）朱朝聘序。朱朝聘原为庄浪兵备道副使，后升关西道右参政（见艺文谱《兵部尚书石星议南川升赏疏》）。从安南郡守张居敬所作跋中可以看出，此谱对西夏建国以来的历史叙述颇详。李云龙是六门由乐都卯寨沟脑庄迁居石嘴村的始祖，葬石嘴钟家洼祖营第一座坟。是我家祖先，故其所修谱世藏我家。同治兵燹，我的曾祖父得志公冒着枪林弹雨，星夜背负此谱至下北山吴家洼避难，始免焚毁。我父亲视为传家珍宝，在修谱时，大量引用了其中史料。此谱保存在乐都马营乡古城村，我于一九六五年冬回家尚见过。惜毁于「文革」，成为不可估量的损失。

凡是明代家谱，皆言青海李氏系西夏国主后裔，与民和县享堂会宁伯李英碑所记一致。（在民和县已发现了李英碑石的残部，关于西夏一段尚在，幸甚。）经过明末以来的多次兵燹，明代家谱毁灭殆尽。我去青海四次调查，均未发现明代家谱，但我仍然希望会有一天奇迹般地出现一部，来证实我这一论断。

西夏李氏在明代中叶已分为二十七门，更早还有几个分支。至明末，各门均有家谱。但自明末以来，遭受了三次大灾难。第一次是李自成部下至青海，突遭兵燹而大量焚毁。第二次是清同治之乱，又遭兵燹而旧谱几乎烧光。第三次是「文革」动乱，明、清家谱大量焚毁。前两次兵燹之后，出现了两次修谱高潮。一次是清初，所谓康乾盛世；一次是清末，即光绪年代。

清顺治十四年（一六五七），李天俞重修《李氏家谱》，他为了充当清朝的顺民，不惜卖祖求荣，伪立沙陀李晋王为